

漳县文史

第十四辑

漳縣汪氏文化研究

資料汇编之二

政协漳县文史委员会
漳县汪氏文化研究会

内部资料
注意保存

书名:汪氏文化研究资料汇编

编者:政协漳县文史委员会

漳县汪氏文化研究会

开本: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:13.5

字数:24 万 印数:1—4000 册

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工本费:39 元

准印证号:甘新出 46 字总 17 号(2005)3 号

承印单位: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序

序

汪受宽

漳县汪氏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家族。汪世显于窝阔台汗七年(1235年)率部归附蒙古,安定了陇右,即随大汗子阔端南下攻宋之蜀地,以军功擢便宜都总帅,秦巩等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。其后两代子孙或带兵攻蜀,或参与平定浑都海、火都、土鲁、火里等人的反叛,成为蒙元稳定西部的依重力量。其后,汪氏子孙世代以军功封爵任官,“追封王者三,封公者十,尚主者二”。在元朝及甘肃古代历史上,很少有能与其匹敌的家族。20世纪70~90年代在县南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,墓地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更使汪氏家族历史的研究如虎添翼。

漳县汪世显家族历史的研究,不仅在蒙元史、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有重要意义,而且在民族关系史、西部开发史和甘肃地方史的研究上也举足轻重。漳县汪氏家族历史,早在明清时期就引起学者的重视,近十几年来更是佳作迭出,成果丰厚。漳县、陇西、兰州、广州、北京、内蒙古等地的数十位学者,广泛深入地对汪世显及其家族的历史进行了多层次、多方面的研究,发表了数十篇文章。其内

容,既有对汪世显父子生平的评价,也有对汪氏族属的探寻,还有对汪氏史事的钩稽,更有对汪氏婚姻圈的分析,以及对汪氏文献和出土文物的钻研。学者们在充分掌握资料 and 悉心探研的基础上,撰文立说,各抒己见,高论横发,成果喜人,推动了漳县汪氏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汪氏文化是漳县独有、突出而且在全国叫得响的文化品牌,在宣传漳县、发展漳县旅游,推动县域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。在中共漳县县委领导下,漳县政协多年来将地方文化的挖掘和宣传,置于政协工作的重要位置,尤其重视汪氏文化的研究。在赵玉忠主席的领导下,政协倡导成立了漳县汪氏文化研究会,为全县进行汪氏文化研究搭建了平台;广泛联络和邀请外地专家到漳县交流研究心得,共商汪氏文化研究之是;还于2005年以政协文史资料的形式出版了30多万字的《汪氏文化研究》一书,聚拢史料,总结成果,交流观点,启迪后学,在全省政协文史资料的编纂出版上别开生面,独树一帜,影响很大。

本人忝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席,又兼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,遵从第一任系主任顾颉刚教授重视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传统,和费孝通主席“做好事,做实事,出主意、想办法”的参政宗旨,我长期关注甘肃地方历史、文化和教育的研究与发展,撰写了一些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,包括探讨漳县汪氏族属的文章。2007年10月中旬,在昆明举办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上,我发表了新撰

序

的《可信与不可信——对漳县〈汪氏族谱〉的剖析》，受到著名历史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施丁教授及著名谱牒专家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铁等人的高度评价。漳县政协赵玉忠主席礼遇学人，亲自安排我和研究生汪小红到漳县考察，并与漳县汪氏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交流，使我们对漳县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，增强了我们为弘扬漳县历史、文化做贡献的决心。

近日，欣闻漳县《汪氏文化研究》之二、之三即将付梓，本辑将发表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，还将刊布漳县《汪氏族谱》等重要资料，以及对汪氏文化研究的评述建言，十分兴奋，期待良多。相信本辑文史资料的出版，必将推动全国漳县汪氏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。谨为之序。

2007年10月22日

目 录

元代汪世显家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

通谱	汪受宽(1)
元诸王念不烈考	胡小鹏(16)
试论巩昌汪氏在蒙元时期进攻四川战争中 的作用	赵一兵(29)
元代汪世显家族的族属再探	胡小鹏 王旺祥(50)
汪氏家族与巩昌都总帅府	王 頔(65)
汪世显降元事实考辩	漆永祥(92)
元代甘肃汪氏万卷楼	田建良(99)
元代盐川汪氏家族研究	汪小红(106)
对汪世显家族史料的几则增补	汪小红(217)
汪氏家族之交游	汪小红(225)
建功巴蜀的汪氏家族	汪小红(240)
结合民间传说看巩昌汪氏的兴衰	汪小红(256)
汪氏家族与阔端王位下	汪小红(268)
汪世显家族世系考	汪 楷(293)
汪氏与合州	李兴华(324)
元代军队与汪氏军职	李兴华(339)

汪氏墓志识略	李兴华(344)
《漳县志》有关汪氏家族记述正误	李兴华(349)
《汪氏家谱》所载惟庆惟孝二名错位	王怀宇(353)
漳县汪氏对云南部分地区民俗的影响	汪普龙(357)
汪世显族属质疑	祥 天(359)
漳盐与汪氏家族	汪小红(365)
汪庸与漳盐销售	李兴魁(389)
也谈漳县汪氏的族属	孙有平(392)
元代书法的一朵奇葩	孙有平(405)
后记	赵玉忠(415)

元代汪世显家族的族属及其 与徽州汪氏的通谱

汪受宽

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,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,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。本文依据历史文献、家谱及碑刻资料,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,官英为汉人,系对文献误读、误释和改窜所致。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,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,殊不可信。

巩昌(今甘肃陇西)汪氏,自蒙古国汪世显始著,是陇右百数十年军功望族。巩昌汪氏族属,由于文献及碑铭记载的含混不一,在 20 世纪前期已被学者叹为“殊可怪也”,^①近年更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。^②巩昌汪氏在蒙元史中地位甚巨,而徽州汪姓家族史又为社会史研究之重要课题,对此问题的辨析,对古代民族融合研究有典型意义。

一、辨巩昌汪氏为汪古族

《元史·汪世显传》早就明确地记载了巩昌汪氏的族属,称:“汪世显,字仲明,巩昌盐川(今甘肃漳县境)人。系出旺古族。”汪古部历史经周清澍先生专题研究,其结论为

学界所公认。汪古族,指“金元时期阴山以北部族。或译雍古、王孤、瓮古、旺古、汪骨、汪古惕……汪古的基本成份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”。^③元人姚燧所撰《便宜副总帅汪公(忠臣)神道碑》,详言汪世显家族汪姓的由来,云:“公王姓,由大父彦忠,世汪骨族,故汪姓。”^④姚氏当是根据汪家人提供的行状资料,称汪世显之父姓王名彦忠,汪骨族人,因族名 Onggur 译为汉字可有许多不同的写法,汪世显遂改王姓为汪姓。

20 世纪上半期,学界对汪世显族属并无歧见。《新元史·汪世显传》完全采信姚燧所说,百:“本姓王,父彦忠,隶于汪古部,故改姓汪。”慕寿祺撰《甘宁青史略》卷 12“汪世显降蒙古”条所加按语,亦直称其“系出旺古族”,^⑤王树民先生抗战中游陇,观看《陇西汪氏族谱》后,在日记中言:“《族谱》自称为唐越国公汪华之后,汪达即其子也,始居陇西云。以《元史》校之,汪氏之姓实为旺古族之简称,《族谱》所记,殆未足凭也。”^⑥巩昌汪氏家族碑铭,出土或存世者较多,张维撰《陇右金石录》收录了汪氏六通碑文,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99 年第 1 期发表吴景山《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》,公布了总共十六通碑的资料。吴文所录 20 世纪 70 年代由漳县汪氏家族墓地出土之十通元代碑志文,除汪惟孝圻志明言“其先世掌汪骨族”外,皆未提及族属事,可否说,在元代,巩昌汪氏的族属是人所共知的。然而,在史书和《陇右金石录》所录传世元代家族碑志中又有汪世显家族为汉族的说法,从而引起学者的讨论。笔者

仔细探究,以为当系误读、误释和改窜的结果。

《元史》卷15《世祖本纪十二》载,至元二十六年(1289)六月,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(汪世显之孙)言:“近括汉人兵器,臣管内已禁绝,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。”元世祖忽必烈回答:“汝家不与它汉人比,弓矢不禁汝也,任汝执之,”显然汪惟和及元世祖都称巩昌汪氏为汉人,这岂不是巩昌汪氏为汉族的最可信的证据吗?否。元朝将境内各民族人分为四等,一等蒙古;二等色目,指跟随成吉思汗东征的西域三十一族,三等汉人,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、契丹、女真、高丽等人,以及云南、四川等省各族人,四等南人,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。汪世显家族本为金朝属下之汪古族,自然属于第三等的汉人之列,所以汪惟和自称“汉人”及世祖称之为“汉人”,皆无其为汉族的意思,不可误读,查《元史》,元世祖曾三次下诏禁私人持有武器。第一次在中统四年(1263)正月“申禁民家兵器”;第二次在至元十六年二月“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矢,其出征所持兵仗,还即输之官库”;第三次在至元二十六年四月“禁江南民挟弓矢,犯者籍而为兵”。^⑦三次所禁对象并不一致,第一次是禁所有居民持有兵器;第二次是禁奥鲁(蒙古、色目军户)及汉人平时持有弓矢,令其出征时到官府领取,用过交回;第三次是专禁原南宋人民持有弓矢。汪惟和与元世祖关于禁汉人兵器的对话,应是对第二次禁令的回应和铨释。但《元史》本纪中却将其系于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条,显然有误。

元世祖时学者王鹗撰《汪忠烈公(德臣)神道碑》，有言：“汪本姬姓。宋末金初，世掌盐川之一隅汪骨族，因氏焉。”^⑧明程敏政解释道，汪世显家族本自徽州汪氏之支裔，“唐季没于李氏，号曰汪古族，犹曰汪氏旧家云尔。西人方言，或误称汪为旺古，碑文以为汪骨云。”^⑨程氏所说极为牵强。首先，汪古族并非仅有巩昌汪氏这一支，若强以巩昌汪古族人为唐汪华之后，其他的汪古族人又是否与汪华有关呢？恐程氏就难以自圆其说了。其次，徽州汪氏的宗谱流传有序，在唐初以前就撰修过三次：第一次为三十一世汪文和撰于东汉建安间，第二次是三十五世汪旭撰于东晋咸康二年(336)，第三次是四十四世汪华撰于隋唐之际。唐贞观间“诏索天下谱，(汪华)因上《汪氏大宗谱》”。^⑩这里所说并非空穴来风，史载：“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，修《氏族志》一百卷成，上之。先是，山东士人，好自矜夸，以婚姻相尚，太宗恶之，以为甚伤教义，乃诏礼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，及四方士大夫谱练族姓者，普索天下谱牒(牒)，约诸史传，考其真伪，以为《氏族志》。太宗谓曰‘……我今定氏族者，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，垂之不朽。’合二百九十三姓，千六百五十一家，分为九等，颁于天下。”^⑪汪氏本于姬姓，郡望颍川，自此当为学人共知。王鹗在金时已是状元，入蒙古为忽必烈所赏识，即位后授翰林学士承旨，制诰典章，皆所裁定，为当朝第一文士。巩昌汪氏家人向其求索碑文，他在据行状撰文称其为“汪骨族，因氏焉”，在碑末铭

文中,又特意言明“西州著姓,因官氏汪”,强调汪世显家族之姓源于汪骨族酋豪之官,同时又说明天下汪氏“本姬姓”的常识。两个汪氏,一来自官(汪古族酋长),一来自始祖之名(“以王父名别姓汪氏”),以相区别。他在文中如此讲明此汪非彼汪,我们怎能误释,据以得出此汪即彼汪的结论呢?

杨奂撰《汪义武公(世显)神道碑》,碑文中有“公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”^⑩句。该碑今已不存,我们无法考证其文。光绪《甘肃通志》撰写时,该书作者曾亲见该碑,说碑“高二丈余,广五尺余,厚尺余,额趺俱完好。为陇西义武王世显神道碑,便宜都总府帅参议巩昌奥鲁都总领门下潘珍书,后面碑文颇多剥落,杨文宪公撰。”按,汪世显死于1243年,死时无封号及谥号。忽必烈继位后始行谥法,“中统三年,论功追封(汪世显)陇西公,谥义武。延祐七年,加封陇右王”。^⑪中统三年为1262年,延祐七年为1320年。而杨奂死于1255年,他撰碑文当在1243年至1255年间,当时汪世显尚无“义武”谥号,故碑额称“义武公”应是中统三年以后所立并镌额。查考元苏天爵《国朝名臣事略》中的《总帅汪义武王传》,其全文引录杨氏所撰神道碑文,其中直言“公系出汪骨族”,^⑫并无“南京徽州”云云句。苏天爵是一位非常严谨的文献学家,其保存元代文献的功勋无人能右,他不可能在著录当朝重臣先辈的碑文时,故意删改某些要害的文字。再查杨奂《还山遗稿》卷上《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》,亦言:“公系出汪骨族。”^⑬而无“南

京徽州”句。因此可以肯定,杨奂原撰碑文根本就没有“系出南京徽州”句。“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”一句,在历代行政区划史上也有极大破绽。金朝疆域不及江南。元时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、路、府、州、县制,歙为县,非为郡,《元史·地理志五》言:“徽州路……县五:歙县,休宁,祁门,黟县,绩溪。”另,所谓“南京”,北宋曾以今河南商丘为南京,辽朝曾以今北京市为南京,金朝曾先后以今辽宁辽阳和河南开封为南京。蒙元之南京,仍指开封,辖地都在江北,在江南的徽州路歙县归江浙行省管辖。《元史·地理志二》载:“河南、江北等处行中书省。……汴梁路。唐置汴州总管府。石晋为开封府。宋为东京,建都于此。金改南京,宣宗南迁,都焉。金亡,归附。旧领归德府,延、许、裕、唐、陈、亳、邓、汝、颍、徐、邳、嵩、宿、申、郑、钧、睢、蔡、息、卢氏行襄樊二十州。至元八年,令归德自为一府,割亳、徐、邳、宿四州隶之,升申州为南阳府,割裕、唐、汝、邓、嵩、卢氏行襄樊隶之。九年,废延州,以所领延津、阳武二县属南京路,统蔡、息、郑、钧、许、陈、睢、颍八州,开封、祥符倚郭,而属邑十有五。……二十五年,改南京路为汴梁路。二十八年,以濒河而南、大江以北,其地冲要,又新入版图,置省南京以控治之。”到了明朝洪武、永乐时,才以今江苏、安徽地置南京(南直隶),下辖有徽州府歙县。《明史·地理志一》载:“应天府……洪武元年八月建都,曰南京。十一年曰京师。永乐元年仍曰南京。”徽州府。太祖丁酉年七月曰兴安府。吴元年曰徽州府,领县六……歙。”另徽州在今安

徽,为汪华后裔聚居地;颍川在今河南,为汪氏始祖封地,唐以该地为汪氏郡望。歙县辖境绝无颍川一名。若杨奂真如其本传所说“博览强记,作文务去陈言,以蹈袭古人为耻。朝廷诸老,皆折行辈与之交。关中虽号多士,名未有出奂右者”,^⑩不应如此缺乏基本的地理和姓氏常识。故《陇右金石录》所录之杨奂撰碑文中“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”¹¹字,可能是明代一位缺乏地理文化常识的巩昌汪氏族人磨补的文字,不足为凭。

还有,因徽州汪华墓庙屡屡“显灵”,在宋元明清被朝廷多次加封,其中元代有:“元泰定三年,特改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,至正元年,颁降宣命明定江西神兵默助,敕封汪公圣主洞源大帝。”^⑪倘若当时朝中承认巩昌汪氏为汪华之后,不应在颁诏时不对巩昌汪氏亦加荣宠或对其“始迁祖”汪达加以封赠。总而言之,元朝文献和墓志文皆以陇西汪氏为汪古部人,无庸置疑。

二、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

从明代开始,巩昌汪氏才不再提汪古族事,而径称为徽州汪华之后。据存有清道光间续修巩昌《汪氏族谱》过录本的汪楷说,“明朝永乐年间,世显七世孙汪福、汪寿兄弟创修陇西《汪氏族谱》,为此将江南《汪氏族谱》所载周秦汉魏晋隋唐初世系逮移过来,同巩昌汪氏的金元世系拼接,并正式分成‘南汪’与‘西汪’两大地域流派,共同以鲁成公次子姬汪为受姓始祖,以越国公汪达为陇上汪氏的‘始迁祖’。”^⑫漳县出土碑志中最早声言巩昌汪氏为徽州

汪华后裔的，是明正德二年(1507)范鏞所撰之《明昭勇将军巩昌指挥使司指挥汪钊墓志》，志文云：“公讳钊，字克明，其先徽州府歙县人。始祖有曰华者，当隋之季，豪杰争雄，尝鞠义旅，保辑歙、宣、杭、睦、婺、饶等六州，以待宁晏。逮唐受禅，知天命有属，则奉籍以归，得封越国公，卒进越王。子达袭爵，移镇陕西巩昌，遂家于盐川，即今漳县是也。历宋暨金，相传为汪古部都总管。迨元□至公八世祖世显，以武功拜巩昌便宜都总帅，卒赠太师、上柱国，谥义武，追封陇右王。”^⑩明程敏政撰《新安文献志》，收录《元史·汪世显传》，以按语说明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联系之始，言：“《汪氏谱》越国公第三子达，袭封上柱国越国公，征贺鲁龟兹高昌有功，世守巩昌。唐季没于李氏，号曰汪古族，犹曰汪氏旧家云尔。”^⑪查徽州汪氏家谱，汪达确有其人。《谱》载，汪华有九子，“达，字德远，世华(汪华本名，入唐避太宗讳，单名华)三子。唐左卫勋府参军，以征贺鲁、龟兹、高昌勋至上柱国，袭封越国公，终会州刺史。薨年五十七。配葛氏，合葬白渠府北二十里。子三：处哲、处惠、处澄。宋绍兴十年，以灵迹并著，敕建庙于歙县龙井山，额曰忠勗。乾道八年敕封忠应侯，庆元五年敕加忠应威勗侯，嘉泰元年敕加忠应威勗昭济侯，宝祐二年敕加忠应威勗昭济协惠侯，三年敕加崇善公，景定五年敕加崇善衍佑公。”贺鲁全名阿史那贺鲁，为突厥叶护，于高宗永徽元年(650)十二月以西域反叛，自称可汗，唐朝派兵讨伐。以《谱》文与《汪钊墓志》及有关文字对照，有三点可辨。其一，《谱》明

言,汪达终官于“会州刺史”,唐朝时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,无《墓志》所言“移镇巩昌”事,更无“家于盐川”事。其二,唐时既无陕西之名,亦无巩昌之名。今陕西、甘肃靖远、宁夏等地时辖关内道;今甘肃陇西,时为陇右道渭州。既然没有陕西巩昌之名,哪来“移镇陕西巩昌”之事?其三,若汪达真定居盐川,则死后应葬于斯地。然《谱》明言,汪达葬于白渠府北。查白渠为汉武帝时白公胜主持修成的关中灌溉渠,唐代仍在发挥作用,所以大历间有“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础,以妨民溉田”。^②该渠“引泾水,首起谷口,尾入栎阳,注渭中二百里”,^③在长安北。宋代学者胡仲所撰《唐越国汪公行状》言,汪华归唐后,“贞观二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”。^④则汪达所葬之白渠府,实其父唐初任职左卫白渠府总军之府第附近。汪达墓园清楚,不可能“遂家于盐川,即今漳县是也”。所以,巩昌汪氏所言汪达事与徽州汪氏谱并不相符,颇多牵强编造之迹,不可信。

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,据说最早是通过元末汪泽民。《婺源大阪谱》载:“元至正中,礼部尚书(汪)泽民尝会(陇右汪义武)王之子孙袭总帅者于燕京,相与通谱。”^⑤查汪泽民于至正三年(1343)奉调京师,参与撰修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三史,至五年书成,后二月,以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致仕回乡。若《婺源大阪谱》所说不误,陇西汪氏子孙会见汪泽民就在至正五年。其时,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云涌,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,权势人物多设法安排后路。在这种情况下,巩昌汪氏提出与徽州汪氏通谱,其目的岂不昭然

若揭！况且，其时汪世显四世孙汪家奴正任从一品的枢密院知院，为顺帝近臣，权势炽热，汪泽民仅至三品的礼部尚书衔致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倘若巩昌汪氏提出通谱的要求，他能拒绝吗？不过，汪泽民是宁国宜城（今安徽宜城）人，而非徽州本籍，所以徽州汪氏谱或未据以改修。如明初《严陵汪氏家谱》，就不载巩昌汪氏事，宋濂的序称赞徽州汪氏历祖闳阔，亦不言巩昌汪世显之勋爵。

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明将徐达奉命西征陕甘，其部将平羌将军冯胜兵临巩昌城东，汪世显五世孙、巩昌守将汪庸率众出降。明朝以汪庸为土官、世袭巩昌卫指挥同知，明太祖还“赐巩昌、建宁、定辽等卫指挥同知汪庸等五人织金袈裟”。^⑤ 巩昌汪氏在新政权下重又衣锦荣华，永乐时，汪庸长孙汪福撰《陇西汪氏宗谱》，已据所闻徽州汪华之于汪达事迹，歪曲其生平，以与巩昌汪氏事相系，称其为巩昌汪氏“始迁祖”，从此以后，巩昌汪氏就由属于少数民族的汪古人变成汉族了。但当汪福之弟汪寿请求大学士杨荣为新撰该谱作序时，杨荣在《序》中虚与委蛇，一再赞叹汪世显及其后裔之勋功，却不及其与徽州汪氏为同宗事。^⑥ 明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汪舜民撰《徽州府志》卷7《人物一·勋贤》有〔唐，汪华传〕，其中云“子……达，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，袭上柱国越国公，镇巩昌”。疑其时徽州汪氏已有与巩昌汪氏联谱事。据明李东阳所撰《汪氏家乘序》，汪舜民为汪华第七子爽之后裔。^⑦ 而作者所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藏本《歙西塌田汪氏家谱》，则为汪华长子汪建后裔所